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临汾市浮山县卷

主编

张金科
姚锦玉
邢爱勤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临汾市浮山县卷 / 刘泽民, 李玉明主编;
张金科, 姚锦玉, 邢爱勤分册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457-0590-4

I. 三… II. ①张… ②姚… ③邢… III. ①石刻 -
浮山县 - 图录 IV. ①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5928 号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张金科 姚锦玉 邢爱勤

责任编辑: 落馥香

助理编辑: 周 雨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 (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 4956036 (综合办)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晋城市景潮办公用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1092mm 1/8

印 张: 86.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590-4

定 价: 4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江 张颌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 贾玉瑞
翁小绵 陈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李尧
李非 李小强 吴广隆 张鸿仁 陈长禄 高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编：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审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编纂指导组

组长：陈长禄
副组长：王德贵 常引根
成员：张彪 王汝雕 李兆祥 张新智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编委会

主任：王煦杰
副主任：刘云生 张奇志 段锦瑞 杨朝辉
成员：姚锦玉 邢爱勤 郑洪峨 程东晓 张德才 李学聪
唐揖尧 张金科 崔金奎 葛运祥 盖培琳 盖延敏
侯平

主编：张金科 姚锦玉 邢爱勤
资料审核：郑洪峨
文字编辑：张德才 李学聪 崔金奎
拓片照像：张勇 乔峰 张文生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布施碑，根据历史、文化价值并有助于当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则，慎重选择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和墓志铭，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与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篇内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称(全称)、简介、石刻录文(全文)。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

八、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一、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

(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

十二、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高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以便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其余均使用规范汉字。

十四、每卷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别。

十五、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括注“下阙”。

十六、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检索,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鼈)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

的原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以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撷,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陈长禄

临汾,史称平阳,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中心地带,现辖一区、二市、十四个县。临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丰厚,地上地下文化遗物十分丰富,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8处,居全省、全国前列,其历代石刻之丰富,更是名冠三晋。

石刻虽然坚硬,也有风化殆尽的时候,加上历史上临汾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强烈地震又多,临汾的碑刻在1949年前就损失不少。新中国成立后,战乱兵燹虽成历史,但古老石刻流失和被盜被毁现象仍未绝迹,如今临汾的石刻除少数保存较好以外,相当一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烟蔓草,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他用,随时都有佚失之虞。

石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大多数碑碣上的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与传世文献相比,石刻文字更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当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它是研究区域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一些学者将金石文字与地方志、宗族谱牒并列为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三大史料来源,是有道理的。

临汾历来重视石刻文字的收集和整理。明清的地方志书,大多收录了本行政区域内的重要碑文。晚清以来,临汾开始有了金石著作。同治年间,洪洞董文灿撰有《山右碑目》书稿一卷,惜已不存;光绪年间,临汾宋琦撰有《山右金石存略》二十一卷,其中卷三至卷二十一今存新绛县;乡宁杨笃在撰写光绪《山西通志·金石志》的基础上,撰有《山右金石记》十卷,刊行于世。光绪年间编成的《山右石刻丛编》,收集了临汾地区87篇碑刻文字,其中半数今已亡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多部金石文字专著。上世纪九十年代,郭居明编撰了《乡宁碑文选》;由王汝雕编著的《山西地震碑文集》和由王汝雕、牛文山编著的《临汾历代碑文选》分别于2003年、2005年出版;2005年,侯马市、曲沃县的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别编印出《侯马碑记》和《曲沃三十八通古碑注》;2007年,李国富、王汝雕、张宝年编著的《洪洞金石录》出版。但在这期间最大的工程是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于2001—2004年组织各县市理事对全市范围内留存的历代碑碣进行的一次全面调查造册。这次调查登记了上自北魏,下至民国各个朝代的碑碣4003通,搜集碑文数百篇,编辑出版了58万字的《三晋石刻总目·临汾市卷》。这部《总目》成为临汾市编纂《三晋石刻大全》的重要参考依据。

此次由三晋文化研究会发起编纂《三晋石刻大全》,以县域为单位,每县一卷。石刻编选时间下限截至各卷定稿,无论编选范围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正是我们所期盼的一件泽被后人的大好事。

临汾市境内现存的石刻中,重要的有:浮山唐玄宗李隆基《大唐龙角山纪圣铭》御制御书碑及元代《蒙哥皇帝圣旨碑》;吉县锦屏山北魏、隋、唐及宋、元摩崖石刻;襄汾北魏、北齐、隋、唐造像碑,清代董其昌撰写的《昼锦堂记》;曲沃宋代吴勉之的《晋恭世子庙碑并序》,元代的《释迦如来成道记》;乡宁元代《重修晋荀息大夫庙碑》;翼城赵孟頫的《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以及元大德十一年的《上天眷命碑》,明代《欧阳永叔醉翁记刻石》;洪洞宋代《大宋新修女娲庙碑铭并序》;尧都区宋代《晋州姑射仙洞新修功德记》;安泽北魏、北齐造像碑等。历代名人撰文书丹的有襄汾虞世南的草书碑,洪洞宋治平元年郭子仪的奏牒碑,金代张商英霍山诗碣,襄汾苏东坡的行草圆碑,文徵明的草书碑,郑板桥的行书碑,侯马《乾隆御笔千叟宴诗碑》,洪洞清代何绍基的《猎碣亭》及香梅的宋拓本勒石的石鼓文,襄汾丁村赵邦清的楹联以及地方一些名人书写的篇章、铭文、诗词、楹联等等。这些石刻在历史、科学及石雕艺术与书法艺术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唐玄宗李隆基的《大唐龙角山纪圣铭》称太上老君为其远祖,在高祖、太宗之际,显化于龙角山。其汉隶八分体书飘逸潇洒,结体紧峭,点画之间自有异趣,实为唐代的

杰作。《晋恭世子庙碑并序》的颜体书法，端严秀健，笔力遒劲，古朴豪放，是宋碑中之佳作。《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书法刚劲沉稳，圆浑遒美，全篇气势连贯，法度严谨，笔老墨秀，洒脱超逸，横竖点画，笔笔着力，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界，是赵体中最完整的一通碑刻。再如明正德九年(1514)《增修尧、舜、禹庙图碑》和明嘉靖十八年(1539)镌刻的《祭祀仪注、尧陵及庙宇建筑分布图碑》均分别记述、绘制了元明以来尧庙、尧陵之规模、布局、建筑形制和陵寝祠宇规模形制等，用图例刊于石，是研究其建置、沿革的有力佐证。襄汾的普净寺，霍州的中镇庙，翼城的乔泽庙，尧都区的大云寺、牛王庙、坡子村，洪洞的广胜寺，吉县的圣母庙，蒲县的东岳庙等地的石刻碑碣，都较详细地记载了元大德七年(1303)和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平阳两次大地震的实况，是考察历代地震、探索地震规律重要的历史证据。《增修康泽王庙碑》记述了平水源头，方圆百里到处涌泉，严禁开山凿石，保护泉源之事。洪洞广胜寺《重修明应王殿碑》，明确规定了三七分水的制度，并设置了铁栏记标，使之正常管理灌溉。另外，乡宁、大宁、吉县、曲沃、隰县、蒲县等地都用碑刻记载了争水、斗水、分水等方面的史料。再如有关教育兴学、发展生产、灾荒赈济、民间习俗、乡规民约之类碑刻，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教育意义。除以上重要的碑刻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革命遗址和文物，其中碑刻也不在少数，所有这些都是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料。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的编纂工作得到了临汾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县(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编纂工作按照预期进度圆满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各县(市、区)分卷的出版发行，不但是对全市范围石刻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而且对于文化强市、文化强省的建设也大有裨益。

序 二

中共浮山县委书记 毛克明

浮山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宏志

浮山县地处帝尧古都平阳之甸,是一个历史悠久,带有神话色彩的地方。据传荒古时期,洪水横溢,帝尧率臣民避水于此,这里的山势随水起浮,遂命名为浮山县。这里文化底蕴丰厚,历史源远流长,遗留的石刻很多。据《三晋石刻总目》记载,现存和佚失的碑刻就多达六百余件。它记载了浮山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在,从人文到民俗等一应俱全的社会大观,成为传承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见证。它昭示着某个时代,某个阶层,某个事件,某个群体,某个人文,在其特定历史时期的永恒与定格。愈是时代久远,愈显示其文化价值弥足珍贵。然而由于时代的久远和时局的变革,加之自然和人为的损坏,现在竖立在原址完好无损的石刻,已所剩无几,大部分碑刻四处散落,难以找见。即以李唐宗祠庆唐观为例,这里原有碑刻二百余件,既有皇家的诏书政令,又有历次修缮的功德纪事;既有达官显贵的吟咏诗碑,又有民众求神祈雨报恩碑记,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内容十分丰富,但现存的断碑残碣只有二十余件。可想而知,浮山全县该有多少珍贵的石刻被遗失和损坏!提起来,令人惋惜不已。

令人欣喜的是省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后,开始就把在全省范围内收集石刻列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项目,并决定按县市分卷编纂《三晋石刻大全》。这一科目的提出给我县收集保护碑记石刻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2004年,根据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具体要求,我县通过收集整理编出了浮山石刻总目,为浮山编写石刻大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在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热情关怀、悉心指导和大力帮助下,又开始了浮山石刻大全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技术含量高,工作难度大,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由文化局牵头,组织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的老同志具体实施。这些老同志不顾年迈体弱,冒着寒伏克难而进,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寻找收集,在泥沙瓦砾中挖掘清理,拓片拍照,深考细琢,精心编纂,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费时一年有余,最终完成这部书的编纂任务。这对推动浮山文化建设无疑是一项特殊的贡献。今借出书之际,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众所周知,没有人能留住时光和历史前进的步伐,而石刻碑记却能留存各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再显时代演化跳动的脉搏,使逝去的历史,在时代“回音壁”上光影重显。有句民谣说得好,“千年的石头会说话,古老的石头会唱歌”。要了解认识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山川名胜,三教九流,风土人情,方志文献是要件,石刻碑记是实证。《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的问世,就是回味浮山,走近浮山,解读浮山,认识浮山的圭臬。它在浮山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史上,将成为璀璨的一页。

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

概述

金石学肇始于北宋,风行于清代,而传流于今。丰富了中华传统的人文环境,补史笔所不及,胜于秩册而久垂,不失为珍贵的文献宝藏。

浮山县毗邻尧都平阳,自古乃唐虞甸服之地,华夏文明滋润了这里的山川草木,石刻文化亦自秦汉以来一脉相承。仅从传世之存碑遗篇可知,浮山至少从西汉起,刻石之风已兴于县治村野。按照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搜集考究整理编纂了《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通览全书,浮山历史文化之浮光掠影,便异彩纷呈于目际。

全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现存石刻,收录自北魏以后的石刻文字 520 通,并逐一配以照片为佐证;第二部分为佚失石刻,收录汉以后佚失碑文 96 篇,并附佚碑佚文存目 237 条。在 616 篇石刻碑文中,按朝代分,包括汉 1 篇,南北朝 5 篇,唐及五代 21 篇,宋 22 篇,金 7 篇,元 20 篇,明 120 篇,清 156 篇,民国 32 篇,中华人民共和国 227 篇。按内容分有功德碑、庙观碑、墓表碑、纪念碑、记事碑和诗文碑。其中多数为庙观碑和墓表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浮山古称神山,自古以来寺庙观祠众多,著名的有庆唐观(又称天圣宫)、玉兔寺、老君洞(亦称石梁殿)和清微观。庆唐观始建于唐武德三年(620),乃道教发源肇建之皇室宗庙,原观虽毁,但其规制、规模不失为山西境内较早的唐代建筑风格的皇族庙观。据业内人士统计,观内原有碑刻二百多通,现仅留唐玄宗御制御书《大唐龙角山纪圣铭》一通,以及附属碑刻若干通,其余为存文四十余篇。其中比较珍贵的唐玄宗御篆额碑《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元元皇帝金篆斋颂并序碑》、《唐明皇诏下庆唐观》、《唐明皇再诏下老君观》、唐玄宗御篆御序《太上老君道德经幢》等。老君洞是继庆唐观后由浮山县地方所建,1957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镶嵌在石梁殿门洞内的《太上八十一显化图碣》,为明嘉庆十年,由本县人士绘刻。另有《真宗训廉、训刑铭刻石》,也十分珍贵。玉兔寺位于浮山县城西南 5 公里的故县村。此地原为神山县县治,“尧嗣故都”即指此。该寺建于初唐,原名玉兔观,武周时改观为寺。《唐晋州神山县玉兔寺现身罗汉于禅乐庵坐化遗嘱》和《玉兔寺古碑遗文》便为其印证,足见武皇崇佛抑道、弃道皈佛之用心。清微观始建于唐初,观内有老君堂,以祀老子,宋、明间历有修葺,《重建清微观记碑》和《重修清微宫老君殿碑记》是为其碑记。

浮山县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英雄豪杰和贤人达士,如汉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光,乃三朝辅政大臣,名声威振华夏。五代晋桑维翰辅佐晋高祖而兴晋,宋时邢昺官至礼部尚书,校定《周礼》、《公羊》、《孝经》、《论语》等;明刑部尚书暴昭,协力抗燕,被俘后断手截脚,断头而卒;明吏部尚书李信;清之张大统,乐善好施,兴学修路,被县人誉为“张善人”;辛亥革命时期,农民起义英雄陈彩彰;以及在民族民主解放战争中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和著名共产党人,都为之立有墓志铭,以表其功德,永昭后世。

浮山自古兴学重教之风昌盛。建文庙,师孔圣,修学宫,建学校,历代不衰。明世宗嘉靖年间《修庙学记》和明神宗万历年间《浮山县弘修庙学记》可佐证,两篇中均记有:“浮山县学宫,尝毁于元季地震之灾……”。清世祖康熙五十七年增修,知县陆张烈在《文庙碑记》说:“斯庙之壮丽宏神,遂甲于三晋”。雍正六年张尧捐己《刊先贤先儒履历碑记》。《文庙大成殿搬迁复修碑记》则记述了现今文庙概况。至于浮山学校创建由义学到书院的发展状况则散见于《张尧先生墓表》、《张体智墓表》以及近代及现今部分新建学校所立纪念碑中。如:《土岭村改建学校记事碑》、《浮山县抗日中学纪念碑》城关中学、北王中学建设纪念碑等。

另有《宾兴德政碑》、《筹备乡会试盘费碑记》则彰显了捐资助学的社会风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浮山属太岳区,经历了诸多战役战斗,涌现出千百革命烈士。为了纪念先烈,激励后人,1955 始先后建《谨建二五团牺牲诸烈士纪念碑》、《谨建三八团牺牲诸烈士纪念碑》、《佛庙岭战斗纪念碑》“青浮战役”“解放浮山城”诸战役纪念碑,等数十通。

这部《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蕴含着许多珍贵的史学资料和学术研究价值。庆唐观系列石刻包括玉兔寺、清微观等石刻,对研究唐朝的崛起、中兴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研究宗教和皇权、道教和道学、道教和儒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学术史料。一篇《大唐龙角山纪圣铭》,道出了老子、李唐和道教关系的天机,老子显圣,华池雷雨、玉兔显形,只能是大唐皇族由“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的哲言悟出的传奇。由老子祠改兴唐观,再改庆唐观的相关碑文中,再从宋太宗五年“诏改庆唐观为天圣宫”,由玉兔观改玉兔寺等碑文中,可见宗教和皇权关系一斑。但有一点应当肯定,唐朝中前期的皇帝,特别是李世民、李隆基信奉的是老子的哲学思想,而非信奉道教经文。这从《大唐龙角山纪圣铭》、唐明皇两下兴唐观诏文中可以证明,这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提供帮助。最为主要的是,这些碑刻描绘了庆唐观以及其安庙寺当时的建筑风格和布局,为恢复这些辉煌文化遗产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还为我们提供了汉博陆侯霍光籍地的学术论题。据《浮山县志》载,霍光是浮山南霍人,唐天宝年间建有祠庙。现存碑中,有清雍正七年其族裔所立《汉大将军博陆侯霍光墓碑》标名墓表一块(当然只能是衣冠冢)。加之县志中其他诗词杂记,如能借之而深入考究,科学验证,或许对开发浮山霍光文化有所裨益。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中收录的造像图碑、绘画、书法碑,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大唐龙角山纪圣铭》是由唐代书法家李隆基御书,为唐隶八分体,字迹遒劲苍秀,力工精巧,孙景文在《天圣宫记事并序》中赞颂此碑铭时说:“宸翰纵横、宝章飞动”,临汾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侯天元和常务理事负岩鸿也称道此碑“书法精进隽美,体态端凝”“笔致灵动、矩度森严,其风格庄重朴实,颇有汉隶遗韵,对全面了解李隆基的隶书发展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唐玄宗御篆额碑《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元元皇帝金策斋颂并序》,乃通直郎行河南府尹阙县城集贤院待兼校理御书史惟则书丹,史则为唐代四大隶书名家之一,他将汉隶与唐隶结合,独成一体,史料文献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较高。玉兔寺所存《“镇宅龟蛇”图碑》蓝本相传出自画圣吴道子之手,为国家级文物,十分珍贵。老君洞石梁殿内《太上八十一显化图碣》作为石刻连环画在国内尚属罕见,1987年2月国家文物鉴定组等专家考察后认为:这部线画石刻连环画,目前是全国首家发现,它既是宗教文物的珍品,也是文学艺术的佳作。1996年立石的《论语箴言名家书法碑林》,集现今书法家妙手之作,镌之以石,以垂来世。

碑文属于文学范畴。《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收录碑文中不乏具有文学欣赏价值的上乘之作。其文体有政论、记事、序文、诗词、颂赞,不拘一格,其表现手法则“赋、比、兴”俱全。最具代表性的仍乃非《大唐龙角山纪圣铭》莫属。该铭行文骈散结合,先志后铭,称得上“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宋真宗《真宗训廉、训刑铭刻石》,《明世宗敬一箴并序》,于今读来不无现实意义;张炳南《重修天圣宫碑记》独树一帜,另辟蹊径,思想犀利,抨击了唐朝皇族关于老子显圣,符命归唐的“恍惚之说”,于其时代能有此文思见地,实属难能可贵。碑文中有的如传奇故事,如《义士羊角哀左伯桃墓赞并序》;有的似山水游记如《蔬园记碑》、《适然亭记》,有的如神话小说,如《唐晋州神山县玉兔寺现身罗汉于禅乐庵坐化遗嘱》。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凡见于金石刻者“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足订史氏之失者”,《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同样具有补益《浮山县志》的功能,堪称石质县乘。仍以“浮山文庙兴建始末”为例,历代县志记载文庙始建于元至元年间。而明嘉靖十年立石的《修庙学记》则载道:“旧文庙在公廨之西

南,兵氛后荡然无遗,莽为荒区,惟前金《宫教毛麾牧达碑记》存焉。迨国(元)朝至元上祀,敦武校尉、县尹史承庆因其故址创建正殿三间,厥后典史董天福像先圣十哲于其中……。”由此足以见证元至元年间所建文庙仍因址于旧文庙,并非最早所建。据有关资料载,唐朝封孔子为文宣王,敕令各县建文庙,因此浮山文庙始建,肯定在元至元前,望日后修县志者细究。

刻石树碑,意在纪述功德,垂之久远。然而金石虽坚,终会因风剥雨蚀而字迹漫漶,或遭人为破坏,震灾埋没而不复得,因此,访求刻石,辑录为书,乃有志于金石学者之责。这部《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基本涵盖了浮山自古至今的石刻资源,反映了浮山石刻文化的真实面目,丰富了浮山历史文化的载体,而且,对于开发浮山文化旅游事业,继承浮山优秀文化传统,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文化强县必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而,在某些方面对于全省、全国金石文化的研究,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史料价值。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编委会

《三晋石刻大全》

荣列国家十二五规划、山西省十二五规划，并荣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度十大好书、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已(即)出书目(有★号者为已出)	定(估)价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	60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尧都区卷》	48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安泽县卷》	28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侯马市卷》	26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曲沃县卷》	38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浮山县卷》	480元
★《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古县卷》	400元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	42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寿阳县卷》	5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	5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	3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榆次区卷》	41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和顺县卷》	300元
★《三晋石刻大全·阳泉市盂县卷》	62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高平市卷》	6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	50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阳城县卷》	66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陵川县卷》	4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城区卷》	400元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	72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沁源县卷》	35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平顺县卷》	40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黎城县卷》	50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卷》	30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林卷》	400元
《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屯留县卷》	200元
★《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	200元
★《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杏花岭区卷》	400元
★《三晋石刻大全·忻州市宁武县卷》	280元
★《三晋石刻大全·朔州市平鲁区卷》	280元
★《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	200元
★《三晋石刻大全·大同市灵丘县卷续编》	200元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陈长禄
序二	毛克明 张宏志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朝·唐·五代

大夏造像碑(十六国夏)	(五)
石梁殿三清造像碑(北魏年间)	(六)
释迦牟尼坐像碑(北齐天统五年)	(七)
李三祭造释迦像碑(北齐天统五年)	(八)
老君八卦炼丹炉(唐武德三年)	(九)
王仁则造释迦牟尼坐像碑(唐上元三年)	(一〇)
段君之墓志(唐武周垂拱元年)	(一一)
马弘信造阿弥陀佛坐像(唐武周载初元年)	(一二)
造像碑(唐武周年间)	(一三)
梁山壁造阿弥陀佛像碑(唐武周久视元年)	(一四)
段文郎造观音立像碑(唐武周长安四年)	(一五)
太上老君道德经幢	(一六)
大唐龙角山纪圣铭	(一八)
乐舞石幢(唐天宝二年)	(二四)
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祖元元皇帝金篆斋颂并序碑(唐天宝二年)	(二六)
“镇宅龟蛇”图碑(唐代)	(二九)
“果老故里”石刻(五代后唐天成元年)	(三〇)

●宋·金·元

显太君邢氏造像碑(宋太平兴国元年)	(三三)
晋州神山县龙角山庆唐观重修功德碑(宋淳化元年)	(三四)
真宗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册文(宋大中祥符七年)	(三六)
中书门下牒天圣观碑(宋天圣四年)	(三七)
玉兔寺石雕造像碑(宋天圣八年)	(三九)
重修清微观记碑(宋元祐七年)	(四〇)
乔永诚墓志碑(金贞元二年)	(四二)